

## 历史地理变迁语境下的黄河鲤鱼研究

武 强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黄河鲤鱼是特色相对鲜明的一类鲤鱼,因其主要出产于黄河沿线而得名,受历史地理条件的影响,黄河沿线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黄河鲤鱼的著名产地,如保德、开封等地。黄河鲤鱼虽然享有盛名,但因沿线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大规模的市场化经营,直到现代交通方式出现之后,这一格局才有所改变。黄河鲤鱼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加上有意无意的垄断生产,在黄河变迁的背景之下,被以河工官员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们,建构出无上美味的声誉,成为黄河水患苦难中的一种调剂,并为其在未来的发展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支撑。

【关键词】黄河鲤鱼; 历史地理; 环境变迁; 社会文化; 语境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5-0052-15

## The Study on the Yellow River Cyprinoids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WU Qiang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Cyprinoids was a type of cyprinoids with relatively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 was named because of the main produced area. Affected by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any places of production had gradually appeared along the Yellow River, for instance Baode, Kaifeng and so on. Although the Yellow River Cyprinoids enjoyed the great reputation, it had been operated by the field fishing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and it had not really obtained large-scale market operat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that this pattern changed. As a relatively scarce resource, the Yellow River Cyprinoids acquired the supreme delicious repu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Yellow River, coupled with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monopoly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lites represented by river workers, and has a future prosp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Cyprinoids; historical geography; environment change; social culture; context

渔业史作为中国经济史、农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自清末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出版之后<sup>①</sup>,海洋渔业与国家利权结合起来,成为近百年来渔业史的主要研究内容;相较之下,对于内地淡水鱼的研究,往往又与地方政府、渔政制度、市场变迁等结合在一起,相关的

[收稿日期] 2021-10-10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河南航运体系与市场建构互动研究”(2018-ZZJH-080)

[作者简介] 武强(1980-),男,历史地理学博士,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

① [清]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江浙渔业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研究综述也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sup>①</sup>。20世纪80年代,中国渔业史研究会等机构组织出版了《渔史文选》等辑刊,比较全面地讨论了从先秦至近代的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渔业状况,并分门别类地对鱼类、资源类、捕捞类、养殖类及加工运销类、科教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sup>②</sup>;此后,许多学者先后投入到对渔业史的研究中,不仅有王子今、刘汉东、张剑光、魏天安、冯贤亮等学者的研究论文<sup>③</sup>,更有张建民、尹玲玲、徐斌、刘诗古等学者的专著成果,他们对长江流域各地渔业的资源、市场及渔政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④</sup>;除了关注渔业史的经济史与社会史内涵外,王建革等学者还以松江鲈鱼为例,讨论了鱼类资源与水环境变迁的关系<sup>⑤</sup>,还有不少学者将研究扩展到文化史领域,如“鱼文化”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sup>⑥</sup>。

鲤鱼史的研究成果不少都可以归入文化史领域,童勉之曾关注鲤鱼与中华文化关系的演变,特别是鲤鱼被神化之后,更是升格到与神异、友谊、爱情等因素联系在一起<sup>⑦</sup>。唐代的鲤鱼产区,也有夏方胜等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全国如关内、河南、河北等诸道都有鲤鱼的分布,但江南道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百姓嗜鱼之风,成为唐代鲤鱼的主要产区<sup>⑧</sup>。总体来看,对于北方地区的黄河流域,“黄河鲤鱼”作为一个从历史上继承而来的名词,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但除了国人耳熟能详的“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对于史籍中“善决、善淤、善徙”的黄河,当前学界更多关注黄河治理方面的河工史,对黄河鲤鱼史的学术性研究仍然非常薄弱,除了少数从渔业资源角度出发开展的调查报告性质的研究<sup>⑨</sup>,在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变迁的背景下,对黄河鲤鱼经济资源与形象演变二者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着墨非常少。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在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黄河鲤鱼的生物特性与文化意义,在与南方“鱼米之乡”迥异的黄河沿线区域,鲤鱼出产地的分布、销售市场的演变,以及与环境与制度变迁相互影响的历史轨迹。

## 一、黄河鲤鱼的自然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的原生鱼类,最显著的特点是鲤科的种、属最多,在全国各大水系中尤其以黄河、长江、珠江三

- ① 李勇:《百年中国渔文化研究特点评述》,《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丁留宝:《渔业史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叶君剑:《中国渔业史研究:学术史回顾与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 ② 吴有为、徐荣等编:《渔史文选》(第一辑),中国水产学会中国渔业史研究会,1984年。
- ③ 王子今:《秦汉渔业生产简论》,《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林业、渔业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张剑光:《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魏天安:《宋代渔业概观》,《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冯贤亮:《清代太湖乡村的渔业与水域治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 ④ 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徐斌:《制度、经济与社会:明清两湖渔业、渔民与水域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 ⑤ 王建革:《松江鲈鱼及其水文环境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 ⑥ 殷伟、任玫:《中国鱼文化》,文物出版社,2009年。
- ⑦ 童勉之:《鲤与中华文化》,《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总第50期。
- ⑧ 夏方胜:《唐代鲤鱼产地及其影响探析》,《农业考古》2015年第4期。
- ⑨ 河南省水利局、新乡师范学院生物系:《河南省黄河鲤鱼初步调查报告》,《淡水渔业》1976年第5期。韩骏飞:《黄河河曲段鱼类资源调查与增殖保护研究》,《山西水利科技》2014年第4期。李思忠:《黄河鱼类区系的探讨》,《动物学杂志》1965年第5期。

流域表现更为明显<sup>①</sup>。黄河鲤鱼,与松江鲈鱼、松花江鳊鱼及兴凯湖白鱼并称中国四大名鱼<sup>②</sup>,对鲤科这一大类来说,鲤鱼在现代生物学的分类体系之内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黄河鲤鱼为例,其分类情况为:鲤科(Cyprinidae)——鲤亚科(Cyprininae)——鲤属(*Cyprinus Linnaeus*, 1758)——鲤种(*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1758);鲤鱼外观的基本生物学特征为:“体长纺锤形,中等侧扁,圆鳞中等大,鲜鱼背侧蓝黑色,两侧及腹面小鱼为银白色,大鱼渐有金黄色光泽。背鳍及尾鳍淡红黄色,其他鳍金黄色,唇黄红色,虹彩肌金黄色。为淡水中下层鱼类,杂食,栖息在浑水或多草处体色较黄,清水处色较淡。喜产卵于缓静多水草处,尤喜黎明前安静时产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的鲤鱼种类,“近60多年在我国中南部发现2亚属12种及数个亚种,黄河流域只有1种”,即*Cyprinus Linnaeus*, 1758, Syst. Nat. ed. X: 320(模式种:*C. carpio Linnaeus*)<sup>③</sup>。当代黄河流域存在外来物种与土著鱼类的杂交,影响到原有野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如德国镜鲤(*Cyprinus carpio* var. *specularis*)与黄河土著鲤的杂交后代,在流域内已经非常普遍<sup>④</sup>。但就历史时期来说,黄河鲤鱼并没有经历过这些杂交变异,下游的河道变迁对于黄河流域的范围或许会有影响,但黄河鲤鱼的品种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其指代的对象仍然是非常明确的。

与纯粹的生物学研究相比,历史学研究中也时常会借用科学化的语言来描述鲤鱼的特征,而古人对鲤鱼特征的记载,虽然不够科学化,但也已经比较清晰地描述其与其他鱼类的不同:“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sup>⑤</sup>在足够了解其生活习性的基础上,鲤鱼的养殖技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非常成熟,甚至有人可以“养鲤鱼而致富”:“陶朱公养鱼法,取鲤鱼二十尾,以立春后上庚日放之,则生子不相食。”<sup>⑥</sup>此处记载虽依托陶朱公而言,但亦可知对如何更好地养殖鲤鱼,时人已经掌握了比较系统的方法。明末《饮食书》载:“鳞有十字文理,故名鲤。崔豹云:‘兖州人呼赤者为赤骥,青者为青驄,黑者为玄驹,白者为白骥,黄者为黄骊,皆以马名者,以其为灵仙所乘,能飞越江湖故也。’其两胁正中一道,从头至尾,无大小皆三十六鳞,诸鱼惟此为上。”<sup>⑦</sup>此处对鲤鱼的特征进行了相对详细的描述,这种对鲤鱼本身的研究,延续至清末民国,并逐渐引入现代西方科学的描述方法,如民国时期的德县,因其在明清时期位于京杭运河畔,在地方志中就留下了相对详细的记载:

鲤,鱼名,体扁而肥,鳞大,口之前端其两侧有触须二对,背苍黑,腹淡黄,鳍红。《尔雅·释鱼》:“鲤,注今赤鲤鱼。”《正字通》:“《神农书》曰:鲤为鱼之首,无大小,脊旁鳞皆三十有六,鳞上有小黑点,文有赤、白、黄三种。”……御河所产者即赤鲤鱼。<sup>⑧</sup>

但总体来看,史籍和方志中对于鲤鱼的记载,往往还是从经典文献出发,很少会加入自己的观察。在世俗化的宋元时期之后,对鲤鱼的更多记载开始相对客观,如为注疏《诗经》而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著作,虽然根本目的在于为经学服务,但确实为后世科学性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清代句曲山农的《金鱼图谱》则上升到了比较纯粹的博物学范式,对于金鱼的生活习性、特征、养殖方法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附有直观的彩图,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以经典为归结的研究取向,也使得当代对黄河鲤鱼史的研究受限于史料,无法进行更多突破性的推进。

① 张志钢等编著:《中国原生鱼·第一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② 王建革:《松江鲈鱼及其水文环境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 李思忠:《黄河鱼类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2-115页。

④ 李芳、张建军等:《黄河流域鱼类引种现状及存在问题》,《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4期。

⑤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许珩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七《广动植之二·鳞介篇》,中华书局,2018年,第340页。

⑥ [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明万历秘册汇函本。

⑦ [明]宋公玉编:《饮食书》卷三《鲤》,明末刊本。

⑧ [民国]李树德修,董瑶林纂:《德县志》卷十三《风土志·物产·鳞介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



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分布和食用价值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所熟知。《诗经·陈风·衡门》一诗中对鲤鱼的记载,将其视为美味的代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此后历代不断有对鲤鱼烹制方法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之外,黄河鲤鱼也进入各类中医文献中,大量药方将鲤鱼肉、眼、鳞、鳃、尾等入药,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这种对鲤鱼在食用、药用方面的记载,既体现了鲤鱼在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又是黄河鲤鱼能够成为一种特产的重要前提,如元代的《饮食须知》一书中记载:

鲤鱼味甘,性平,其肋鳞一道,从头至尾,无大小皆三十六鳞。阴极则阳复,故能发风动火,同犬肉、豆藿食令消渴,同葵菜食害人。天行病后及下痢者、有宿症者俱不可食,风病人食之贻祸无穷,服天门冬、紫苏、龙骨、朱砂人忌食。鲤脊上两筋及黑血有毒,溪闲生者毒,在脑山上水中生者不可食。炙鲤勿使烟入目,大损目光,三日内必验鲤鱼子,合猪肝食能害人,勿同鸡肉、鸡子食。<sup>①</sup>

此处对作为药材使用的鲤鱼,着墨颇多。至于明确指出鲤鱼出产地的史料,可参见清代汪绂《医林纂要》的记载,“彩而金者,洛鲤最贵,江汉次之,吴会而下”<sup>②</sup>。此处所谓“洛鲤”在更大的范畴内则是属于黄河鲤鱼的组成部分,乾隆《河南府志》引用《埤雅广要》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言洛以浑深宜鲤,伊以清浅宜鲂。”<sup>③</sup>对伊洛河流域鲤鱼的生活环境进行了比较科学的介绍,与当代学者对鲤鱼生活环境的分析<sup>④</sup>,有颇多相似之处,使得伊洛河下游一带成为黄河鲤鱼的主要产地之一。

除了食用和药用之外,早在先秦时期,鲤鱼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有了自己的独特地位。黄河鲤鱼的早期记载,被归入鲤鱼传书的典故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蔡邕最早在词中创造出鲤鱼传书的典故,“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sup>⑤</sup>鲤鱼作为书信代名词的记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延续,并逐渐普遍化,“黄河鲤”也成为其中一员:“虽牵倚门念,犹胜捧檄喜。书止慰索居,时付黄河鲤。”<sup>⑥</sup>

由于鲤鱼的这些重要象征意义,对其记载也会相对详细。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往往将鲤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归入到“灵异”之类的文献中,如明代杨慎在嘉靖年间完成的《异鱼图赞》,以及万历年间胡世安的《异鱼图赞补》等,对史籍中各种具有灵异之兆的鱼类做了分类梳理的工作。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和传说。《太平广记》中,引用《三秦记》记述了这一典故: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激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sup>⑦</sup>

此处是对“鲤鱼跳龙门”最为形象的早期记载,也是黄河鲤鱼被单独提及之处。李白在《赠崔侍郎·其一》中也称:“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sup>⑧</sup>因此,鲤鱼在鱼类中的地位,因

① [元]贾铭:《饮食须知》卷六《鱼类》,清学海类编本。

② [清]汪绂撰,江凌、孔尧其、应晓燕等注:《医林纂要探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③ [清]施诚修,童钰、裴希纯纂:《河南府志》卷二十七《物产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同治六年(1867年)补刻。

④ 林鹏程等:《黄河伊洛河中下游鱼类多样性及群落结构》,《湖泊科学》2019年第2期。

⑤ [汉]蔡邕:《蔡中郎集》外传《饮马长城窟行》,四部丛刊景明活字本。

⑥ [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清江三孔集》卷五《送毕公叔使河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⑦ [唐]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六六《水族三·龙门》,中华书局,1961年,第3839页。

⑧ [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一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1736页。

“鲤鱼跃龙门”之典故,也就上升至极高,即所谓“鲤鱼,诸鱼之长,谓其能化龙也”<sup>①</sup>。此类记载,不一而足。不过,对于鲤鱼是否具有洄游的特性,在各种生物学文献中并未专门提及,至于鲤鱼常常逆流而上的特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新鲜氧气;此处所谓跳龙门的鲤鱼,其来源于何处,应该如李白诗中所言“本在孟津居”,距离龙门并不远。至于潼关以上的山陕峡谷地带,“黄河至此向南落差甚大,下游平原鱼类无力上溯”<sup>②</sup>,因此,黄河上游地区的鱼类基本上能够保持古老种的基本性状。

正因为鲤鱼喜逆流而上的这一特征,史籍中大量诗词依托鲤鱼,将自身对阶层跳跃的梦想融入其中。《文苑英华》中有《河鲤登龙门》一诗:“年久还求变,今来有所从。得名当是鲤,无点可成龙。备历艰难遍,因期造化容。泥沙宁不阻,钓饵莫相逢。击浪因成势,纤鳞莫继踪。若令摇尾去,雨露此时浓。”唐代诗人元稹也有诗称:“鱼贯终何益,龙门在此登。有时当作雨,无用耻为鹏。激浪诚难泝,雄心庶自凭。风雷潜会合,髻鬣忽腾陵。泥滓辞河浊,烟霄见海澄。回瞻顺流辈,谁敢望同升。”<sup>③</sup>鲤鱼在唐代的地位,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时期。因“鲤”“李”二字同音,李唐统治者们对此颇为在意,于是,唐玄宗在开元十九年(731)正月,“己卯,禁捕鲤鱼。”<sup>④</sup>《酉阳杂俎》中也有过记载称:

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鰓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sup>⑤</sup>

当然,对于禁捕鲤鱼的限制,仅仅在唐朝推行而已,具体的实行效果是大打折扣的。《酉阳杂俎》本身也称:“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庶子张文规又曰:医方中畏食鲤鱼,谓若鱼中猪肉也。”<sup>⑥</sup>从这个角度而言,唐代人不食鲤鱼,似乎更多是因为鲤鱼并不美味,而不是由于皇家的避讳。

总之,鲤鱼成为祥瑞,自唐以后已经基本定型,而且能够成为祥瑞的鲤鱼,往往以黄河沿线者为最灵验。南唐时期《钓矶立谈》中即引用鲤鱼的祥瑞典故称:

吴王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闾,忽一旦有黄冠道人,状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为鲤鱼形,自云钟离人也,行歌于市曰:“盟津鲤鱼肉为角,濠梁鲤鱼金刻鳞,盟津鲤鱼死欲尽,濠梁鲤鱼始惊人。”又云:“横排三十六条鳞,个个圆如紫磨真。为甚竿头挑着走,世间难遇识鱼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数十篇,时人莫能晓……及烈祖受命,复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验。<sup>⑦</sup>

此处所提及的盟津、濠梁等地,在唐宋时期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在唐代之后,“鲤”“李”二字发生了内在的联系,使得鲤鱼被赋予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然而,当代黄河沿线地区,在提及鲤鱼的时候,往往是将其与食用性联系在一起的(表1),这也使得黄河鲤鱼的经济特性比较明显。

表1 黄河沿线地区鲤鱼特产的分布

名称	产地	名称	产地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特色黄河鲤鱼	
鄂尔多斯黄河鲤鱼	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	刘家峡黄河鲤鱼	甘肃省临夏永靖县
		糖醋黄河鲤鱼	宁夏固原原州区
郑州黄河鲤鱼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	包头黄河鲤鱼节	内蒙古包头昆都仑区
东阿黄河鲤鱼	山东省聊城东阿县	万家寨黄河鲤鱼	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

① [清]李希贤修,潘遇莘、丁恺曾纂:《沂州府志》卷之十一《物产》,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刻本。

② 刘慧,杜昭宏等:《黄河内蒙古段的鱼类区系及新发现》,《北方农业学报》2016年第1期。

③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一百八十五,明刻本。

④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本纪第五《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页。

⑤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许珩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七《广动植之二·鳞介篇》,中华书局,2018年,第340页。

⑥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许珩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之八《支动》,第559页。

⑦ [宋]史温:《钓矶立谈》不分卷,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续表1

孟津黄河鲤鱼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	河曲黄河鲤鱼	山西省忻州市河曲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吴堡黄河鲤鱼	陕西省榆林吴堡县
		徐有才红烧黄河鲤鱼	陕西省渭南潼关县
南海黄河鲤鱼	内蒙古包头东河区	吉利黄河鲤鱼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
高青黄河鲤鱼	山东省淄博高青县	新乡黄河鲤鱼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
孟津黄河鲤鱼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	东明黄河鲤鱼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
		阳谷糖醋黄河鲤鱼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
		东平湖黄河鲤鱼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
		齐河黄河鲤鱼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

资料来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网(<http://www.zgdlibz.com/>)。

二、黄河鲤鱼的空间分布

黄河鲤鱼的分布,遍及上中下游,但并非随处皆有,往往随各自区域是否有中心或节点城市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些中心城市或节点城市的分布,又以黄河沿线的历史地理条件为前提,这也是黄河鲤鱼成为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原因。早在明末清初,文人笔下的黄河鲤鱼出产区域记载,已经遍及黄河的上、中、下游地区;根据常理亦可推知,一旦物产分布范围较广,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就开始出现。

至于黄河上游鲤鱼的出产,最远可达兰州附近,“杨家湾、雁滩、马滩等地均有捕获,大部来自下游”<sup>①</sup>,不过相较于其他鱼类,兰州附近黄河鲤鱼的产量并不成规模。与此相似,宁夏附近的黄河中,鲤鱼产量也并不多,康熙三十六年(1697)闰三月二十三日,在宁夏出巡的康熙皇帝谕称:“朕在宁夏……近日,顺流而乘舟,而行者亦多。黄河中鱼少,两岸桤柳、席茭草、芦苇中,有野猪、马、鹿等物。”<sup>②</sup>因此,相较于下游而言,宁夏黄河中的鱼类出产是相对较少的。清末民初的《清稗类钞》中称:“宁夏之鲤,隆冬渔师凿冰,取以致远。然肉粗味劣,与南中产者无殊,非若豫省黄河中所产者,甘鲜肥嫩,可称珍品也。”<sup>③</sup>此处对于宁夏地区鲤鱼的评论,虽然并未指明是产自黄河,但通过与下游河南省黄河鲤鱼的对比,可知截至清末民国时期,该地出产于黄河者其数量虽不成规模,但也有部分可以远销至外地。至于内蒙古境内黄河沿线地区,鲤鱼的产量也非常有限,虽然在鱼类调查中能够确定该区域黄河中以鲤科等种类、数量最多,但除了春夏两季能对鲤鱼、鲫鱼等进行小规模地捕捞,作为食用和饲料之用外,其他鱼类都缺乏产业性的经济意义<sup>④</sup>。

相形之下,黄河中下游的鲤鱼资源,则是相对丰富的。明末的熊明遇,曾描述位于黄河上游的偏头关附近,品尝黄河鲤鱼的一次经历,“偶过杨无我,酌蒲桃酒,因言偏头、雁宁黄河鲤鱼肥美”,在该诗中即称:“著屐相过子云亭,顷刻盘尊随意设。并州美酒酌蒲桃,醇甘石蜜殷红血。因君备兵雁宁间,为说黄河如丙穴。锦鲤银鳞三尺长,鲜肥塞上酥流滑。剪烛不知更漏添,湿泥漏映半边月。”<sup>⑤</sup>如此美味,即便是在战乱纷仍的明末,也仍然使作者流连许久。

位于偏头关下游的保德州,同样出产黄河鲤鱼。关于保德州的来历及黄河鲤鱼的出产,《大明一统

① 王香亭、贺汝良、赵宏谟:《兰州附近黄河的鱼类》,《生物学通报》1956年第8期。  
② [美]史景迁著:《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附录一,温洽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172页。  
③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饮食类》,中华书局,2010年,第6475页。  
④ 赵肯堂:《呼和浩特的鱼类调查》,《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3年第1期。  
⑤ [明]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诗部卷五,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熊人霖刻本。



名胜志》中有过详细的描述：“保德州，在府城西北五百里，本岚州地，宋析置定羌军于此。景德初改保德军，寻立为州。黄河西北自大同府流经州界，……有水寨在州东北二十里义门村黄河中流，岿然屹立，高二十八丈，周围如之。其地出石花鱼，以食石花，肥而味美。”<sup>①</sup>此处虽然未能指出石花鱼为鲤鱼的一种，但之后的各种记载纷纷见诸史籍，保德石花鱼的名声如此之大，有部分志书甚至将其与鲤鱼分列，万历《山西通志》在其物产志中就直言：“石花鱼，出保德。缸钉鱼，出汾河。鲤鱼、鲇鱼、鲫鱼，俱出晋祠。”<sup>②</sup>这种单列石花鱼的记载，一直延续到清代，如雍正《山西通志》的《物产志》载：“石花鱼，北方鱼中肥美第一，几驾南洲而上之。”<sup>③</sup>

清初康熙年间的曹溶，也记载了保德州出产黄河鲤鱼的情况，在《赠保德守苏生紫二首》之一中，称“冰月黄河鲤，金盘作鲙香”，并以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来暗指“兴王才不乏，穷塞总循良”<sup>④</sup>。保德附近的黄河鲤鱼，被提及之处甚多，明代谈迁在《枣林杂俎》中亦称：“保德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产处仅三十里，以食石花而肥，曰‘石花鱼’”<sup>⑤</sup>。明末清初，杨士聪曾以其他各类鱼，同保德的黄河鲤鱼进行了比较：“滦州之鲫与此相类，又食奚物而肥？”并对此解释为“余以为地气使然尔”<sup>⑥</sup>。

吴振棫对石花鱼为何会出产于保德一带，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石华鱼，河鲤也，出保德州天桥峡下。峡险，米筏过之易坏，鱼食米故肥。岁以冬贡，大臣间有被赐者，刘文正（即刘统勋）有《赐石华鱼恭纪诗》。”<sup>⑦</sup>这种对于石花鱼的吟诵，对于当地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宋萃曾记载府谷县李国瑾的事迹：“府谷李玉衡国瑾，古君子也，为国学典簿……著有《石花鱼赋》，甚佳，曾书一寄余，为友人携去。”<sup>⑧</sup>不过，刘统勋和李国瑾的诗、赋，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但却保留了石花鱼曾经极富吸引力的证明。

与保德县隔黄河相望的府谷县，也同样出产黄河鲤鱼，《榆林府志》称，“鲤，府谷县天桥峡下者，名石花鱼，极佳”<sup>⑨</sup>，其黄河鲤鱼之名称、产地（天桥峡口），几乎与一河之隔的保德县一样；位于保德黄河下游，与府谷县同属榆林府的葭县（今佳县，清代为葭州，下同），也有出产。雍正《陕西通志》引《葭州志》载：“石花鱼，鲤类，鳞有金色。按今石花鱼出府谷黄河中，冬啖石上花，味极肥美。”<sup>⑩</sup>直到民国时期，记载不绝于书：“鲤，鳞有金光，左右各一行，形如缕著衣物上，亦号石花鱼。”<sup>⑪</sup>葭县因远离天桥峡，对于鲤鱼的解释便无法比附保德、府谷二地，只能从其外形特征来说明，但仍然借用了石花鱼的名称，亦可见该名称影响之大。

山陕峡谷黄河沿线地区，鲤鱼的产地除了偏关、府谷、保德等地，再往下游也有分布，如清代蒲州府临晋县：“鲤鱼、鲇鱼、鳖均产夹马口、吴王渡河边，鲤鱼颇肥美。”<sup>⑫</sup>沿黄河向下游延伸，潼关等地也是出产鲤鱼的区域：“鱼惟黄河红尾鲤最佳，然人不善取，发河时最多。”<sup>⑬</sup>直到民国时期，地方志中仍然称：“鱼之属惟鲤为最佳，诗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盖自古为然矣。”<sup>⑭</sup>根据《潼关卫志》的记载，黄河鲤鱼并非是

① [明]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山西名胜志卷之二，明崇祯三年（1630年）刻本。

② [明]李维祯纂修：《山西通志》卷之七《物产·鱼属》，明万历刻后印本。

③ [清]石麟纂修：《山西通志》卷四十七《物产·保德州》，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通行本。

④ [清]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二十《五言律》，清雍正间刻本。

⑤ [明]谈迁撰，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中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487页。

⑥ [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卷四，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⑦ [清]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第304-305页。

⑧ [清]宋萃撰，蒋文仙校点：《筠廊偶笔》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⑨ [清]李熙龄纂修：《榆林府志》卷二十三《食志·物产·鱼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刻本。

⑩ [清]刘于义修，沈青崖纂：《陕西通志》卷四十四《物产二·鳞类》，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

⑪ [民国]陈琯修，赵思明纂：《葭县志》卷二《物产志·鳞属》，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印本。

⑫ [民国]俞家骥等修，赵意空等纂：《临晋县志》卷三《物产略》，民国十二年（1923年）铅印本。

⑬ [清]唐咨伯修，杨端本纂：《潼关卫志》卷之上《田赋第四·土产》，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

⑭ [民国]罗传甲修，赵鹏超纂：《潼关县新志》卷之上《田赋志第三》，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本。

一种以人工饲养为主的鱼类,仍然需要直接在黄河的上下游地区捕捞,由于人工养殖的不足,直接影响到黄河鲤鱼产量的扩大。

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南境内,因黄河水势平缓,盛产鲤鱼。在黄河刚刚进入华北平原的荥泽县,清末文人何绍基也在诗中记载,“荥泽蔡梦塘明府署食黄河鲤,甚美,梦塘云以鳞尾皆赤为验”,诗称:“河流终古浊,鱼味足脂膏。柳贯烦贤宰,盘空愧老饕。雪腴虽可贵,赭尾实因劳。”<sup>①</sup>由于黄河水道情形适合鲤鱼的生长,荥泽县黄河沿线一带成为重要的鲤鱼产地。清末光绪辛丑年(1901年)五月二十八日,华学澜在赴贵州主持乡试的途中,“未初三刻余抵荥泽,大令陈阜乡毓藻,山东曲阜人,现署荥泽,亲身迎于郊外,距县城二里许,土山高耸数丈,中通小径一线,不容方轨,城在山上,入城假人龙书院为行馆宿焉……晡时微雨,晚饭食黄河鲤鱼,甚美”<sup>②</sup>。

当然,黄河鲤鱼最为著名的,还要属开封附近黄河出产者。清末翁心存曾将旅汴时期品尝过的黄河鲤鱼,与其他地区的知名美食进行对比,以突出黄河鲤鱼之美味:“两年客大梁,饱吃黄河鲤。狸肪及鸭觔,浪得虚名耳。中间走长安,臣朔饥欲死。易酒常苦酸,冰鲜不盈簋。区区换羊书,肉食一何鄙。弹铗歌无鱼,徙倚过燕市。”<sup>③</sup>这种评论,虽然有夸张之嫌,作者却能够理直气壮,由此也可知黄河鲤鱼留给其印象之深刻。《清稗类钞》中,也如此评论:“黄河之鲤甚佳,以开封为最多。仿南中烹鲋鱼法,味更鲜美。”至于“南中”地区如何烹制鲋鱼,徐珂也在“蒸鲋鱼”一节中描述:“鲋鱼去肠不去鳞,去血水,以花椒、砂仁酱搗碎,水、酒、葱拌匀,和蒸之,去鳞供食。或用蜜酒蒸之。惟不可去背而取肚,以至真味全失。”或者如江、浙、闽等地烹制方法:“以火腿、猪油、笋、瓜、姜加水而蒸之,煎炒则无味。或醉以酒糟,亦佳。”<sup>④</sup>由此可知开封等地的黄河鲤鱼,以清蒸之法烹制,味道非常之鲜美。

明代嘉靖年间的《兰阳县志》载,“畜类……产于吾邑者,虽非珍禽奇兽……洛鲤河鲋则又兼得之矣”;但这种物产,在地方志中的记载,却往往更关注其象征意义:“金鲤出河中,网来畜泮宫。沈鳞跃春雨,烧尾俟秋风。云路池桥接,禹门水浪通。及时头角奋,行见化成龙。”<sup>⑤</sup>相较于物产的经济价值,鲤鱼的象征意义在文献记载中,似乎更重要一些——这种文化象征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对鲤鱼作为商品的功能。

流经河南之后的黄河下游区域,鲤鱼的出产亦颇为著名,乾隆《徐州府志》称:“黄河鲤,背厚味甘,不让江鲤。”<sup>⑥</sup>同治《徐州府志》则改“江鲤”为“江鱼”,但都通过对比指出了黄河鲤的美味。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后,下游的山东境内,黄河鲤鱼的分布也比较集中,清末山阴人陈锦在游宦济宁(任城)时,曾有对黄河鲤的吟咏:

黄河鲤,一尺肥,昔游江南掉瀚海,今道淇汶下青齐。髻鬟曝日龙门西,雷公渺此尾勿击。百试不逐鲲鹏飞,罡风挟之走粲粲。银鳞衣巨浪,吹捩轮沟泥。五里一涵洞,十里一湓蹄。石梁止水密如篴,到此一跃阻天梯。黄河鲤,一尺肥,屠沽手里筠篮提。<sup>⑦</sup>

此处首先叙述了黄河鲤鱼跃龙门的典故,最后一句则点明其市场交换的情形,可知此时在济宁一带,黄河鲤鱼至少已经进入相对较大的生产与市场规模了。

①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一,清同治六年(1867年)长沙无园刻本。

② [清]华学澜:《辛丑日记》不分卷,民国商务印书馆本。

③ [清]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六·古今体诗一百一首之《食鲋鱼有感》,清光绪三年(1877年)常熟毛文彬刻本。

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三册《饮食类》,中华书局,2010年,第6475、6471页。

⑤ [明]褚宦修,李希程纂:《兰阳县志》卷之二《田赋志》,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刻本。

⑥ [清]王峻、石杰纂修:《徐州府志》卷五《物产·鳞类》,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

⑦ [清]陈锦:《补勤诗存》卷十五《莲亭今雨集·任南小乐府八章·黄河鲤》,清光绪三年(1877年)橘荫轩刻,光绪十年(1884年)增修本。



### 三、黄河鲤鱼的生产 and 市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整个黄河流域都有分布的黄河鲤鱼,但其总产量非常稀少。总体来说,黄河鲤鱼资源的这种稀缺性,是受黄河及其沿线特定地理环境制约所形成的。

作为营养结构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鱼类自古以来就非常受到重视,并形成一系列的文化典故。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十六日,时为太上皇的赵构率后宫及百官游览西湖,“命尽买湖中龟鱼放生,并宣唤在湖卖买等人,内侍用小彩旗招引,各有支赐。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后苑供应。”<sup>①</sup>此后,宋嫂(鱼羹)作为鱼类烹制的美味代称,开始流传开来,至明清时期,关于黄河鲤鱼有不少相关记载,如清代周劼在《汴梁竹枝词》中对黄河鲤的吟咏:“宋嫂鱼羹久未尝,莼鲈味美忆江乡。盘餐只算黄河鲤,出水新鲜入饌香。”<sup>②</sup>以此之故,许多史料都在种类繁多的鱼类中,对鲤鱼和其他鱼类在味道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以此也可以展现出黄河鲤鱼的生产与市场范围。钱泳在《履园丛话》中,通过对比的方式,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鱼类,各自受欢迎的情况: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亚于今之南腿,不过存其名而已。惟鱼之一物,美不胜收,北地以黄河鲤为佳,江南以螺蛳青为佳,其余如刀鱼、鲈鱼、鲫鱼、时鱼、连鱼、鳊鱼,必各随其时,愈鲜愈妙。若阳城湖之壮鳊,太湖之鳊与鳊,终嫌味太浓浊,比之乡会墨卷,不宜常置案头者也。<sup>③</sup>

因此,对于鲤鱼这种食物味道的记载,不同作者的笔下往往都会与自己曾经享用过的美味进行对比,进而突出其滋味的独特性。此处特别指出,各种鱼鲜之味道,应以清淡为主,否则便不适宜日常饮食。对于黄河鲤鱼,史籍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载自然也在于其美味的程度,这一点是其能够发展出市场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州少鱼,然有水处其鱼多美。《毛诗》:“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是也。又《河洛记》引谚云:“伊洛鲂鲤,天下最美。伊洛鲤鲂,贵于牛羊。洛口黄鱼,天下不如。”言洛水浑而深,宜鲤,伊水清而浅,宜鲂也。其实,伊洛鲂鲤之味,远不及黄河,始知诗人之言审也。<sup>④</sup>

此处对于黄河沿线无法大规模饲养鱼类的记载,无疑是切合史实的,但就黄河鲤鱼而言,其美味程度甚至要超出《诗经》中对鲂鲤的记载,确乎是需要深入考察的。清后期的梁章钜在《浪迹三谈》中,对黄河鲤鱼也有过详述:

黄河鲤鱼足以压倒鳞族,然非亲到黄河边,活烹而噉之,不知其果美也。余以擢桂抚,入觐京师,至潼关即欲渡河,城中同官皆出迎,争留作晨餐。余曰:“今日出门,甫行二十里,不须早食。拟再行二十里,方及前驿午餐为宜。”费鹤江观察曰:“缘此间河鲤最佳,为他处所不及,且烹制亦最得法,不可虚过耳。”余乃从所请,入候馆食之,果佳,当为生平口福第一,至今不忘。吾乡惟鲂鱼可与之敌,而嫌其多刺,故当逊一筹也。京师酒馆中,醋溜活鲤亦极佳,然风味尚不及潼关,殆以距黄河稍远耳。《随园食单》中独遗此味,实不可解,潼关固随园行滕所未到,而京

① [宋]周密:《武林旧事·后武林旧事》卷一,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

② [清]周劼:《汴梁竹枝词》,载《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周劼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二甲第九十名进士,历官河南辉县、太康、商丘等地知县,后升知州、知府。

③ [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卷十二《治庖》,中华书局,1979年,第328-329页。

④ [清]汪价:《中州杂俎》卷十七《物类三·麟志·洛鲤伊鲂》,民国十年(1921年)安阳三怡堂排印本。

中之活鲤,岂亦不足系其怀来乎?<sup>①</sup>

对于黄河岸边的潼关来说,黄河鲤鱼似乎是一道家常菜,在接待官员们的“候馆”中都可以烹制品尝,其美味程度也使得从小见识各类河鲜的梁章钜为之折服;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运输条件的限制,使黄河鲤鱼的市场仅能够分布于黄河沿线地区。

当然,黄河鲤鱼的美味及受欢迎程度有如此多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产量无法大规模提高,直至清末,唐宴的《庚子西行纪事》中曾提及在潼关时享用黄河鲤鱼的情况:“此地黄河鲤鱼最肥,有酒名黄河水,颇美……居潼关久,日惟游行山泽或入酒肆。然本地酒物极少,惟酱菜极佳,多以酱杏仁、酱花生、酱肉等下酒,若黄河鲤虽美,非恒有之品,仅三尝而已。”<sup>②</sup>这种“非恒有之品”的感叹,也应该是各类文人都能够感受到的,与官员到访时期的敞开供应相比,肯定大为不同。

明清两代,时人未尝没有考虑过人工饲养黄河鲤鱼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最终仍然选择以野生捕捞为主要作业方式。黄河下游因为不断发生的决溢,不具备稳定的河道条件,中游是因为在山陕峡谷内,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力难以施展。由于无法产生大规模的经济效益,黄河鲤鱼在史籍中的记载,只能更多地表现其文化意义。

查慎行《黄河打鱼词》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位于黄河下游苏北地区的鱼类生产与沿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

桃花春涨冲新渠,船船满载黄河鱼。大鱼恃强犹掉尾,小鱼力薄唯噉水。鱼多价贱不论斤,率以千头换斗米。河壩大潦秋不登,今年两税姑停征。但愿田荒免逋赋,与官改籍充渔户。<sup>③</sup>

至于这些“黄河鱼”,是否均为黄河鲤鱼,或者鲤鱼究竟占有多少比例,尚待考证;但与远离黄河的其他区域的农户相比,“靠水吃水”的黄河沿线地区农民,毕竟可以依靠捕鱼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位于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巩义,渔户也有相当大的数量:

河鲤自古称美,鲂、鲫次之。吾县系洛水入河之处,洛水之鱼率来自黄流,犹然河产也。县中渔户颇繁,傍洛居者十之七,傍河居者十之三,终年操竿纶生涯,以供一方鲜食,时或贩鬻车站远客。旧城水势汪洋,产鱼极伙,城厢居民一部,亦常藉以谋生。<sup>④</sup>

1925年,于右任曾有诗《黄河北岸见渔翁立洪流中》:“劳者无名逸有功,便宜毕竟属英雄。世人都道河鱼美,不见渔翁骇浪中。”并有作者自注:“黄河鲤,必手捕者味始佳,故岸边浅水处,多见渔者立其中。”<sup>⑤</sup>因此,直到民国初年,河南境内的黄河鲤鱼仍然以野生为主,需要渔民以最原始的捕鱼方法获得。山东省的黄河沿岸,渔民们聚居于济南城外的泺口,黄河鲤鱼也是其主要捕捞的对象:“沙岸溪边路,人家柳下门。酒垆分记里,渔户聚成村。”<sup>⑥</sup>

黄河鲤鱼的市场规模与黄河鲤鱼的产量相一致,受其美味所惑,黄河鲤鱼的主要消费者往往集中在皇室或官僚阶层。以盛产“石花鱼”而著称的保德州,在明代末年就已经面临着来自各级官员的勒索:

保德蕞尔边城,有何异产哉?……独鱼颇肥,石炭颇饶,蔬圃略具,磁铁器颇适用,即受害无已时焉。愿鱼之取不取,其权在上,二百年来,仅见巡按陈公、刘公,巡抚沈公、魏公严为禁止,乃未几渐弛。幸而岢岚道相继福清陈公、南乐李公,西粮厅相继云南杨公、江夏冯公,城堡

① [清]梁章钜撰,陈铁民点校:《浪迹三谈》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第486页。

② [清]唐宴:《庚子西行纪事》,民国刻求恕斋丛书本。

③ 侯全亮等选注:《黄河古诗词》,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④ [民国]刘青莲、张仲友等纂修:《巩县志》卷七《民政志·实业·渔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刊本。

⑤ 于媛主编:《于右任诗词曲全集(典藏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28页。

⑥ [民国]毛承霖纂修:《续修历城县志》卷九·王所礼《由泺口入城诗》,民国十五年(1926年)铅印本。

斤祥符吴公,复为严禁,渔户始无鬻女卖牛之惨矣。<sup>①</sup>

当然,这种所谓严禁勒索的作风,并没有真正改善。同样在一部志书中,还有关于石花鱼另外的记载:“明季,每冬上司取鱼,贻害甚惨,至有鬻牛卖女者。万历十四年,巡按御史陈、三十九年巡抚魏,皆行文严禁,未几复寻旧辙,渔户苦之。”<sup>②</sup>这种特产的石花鱼,一旦成为贡品,往往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最上层的皇帝,看待这种“石花鱼”贡品的态度,往往会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而不同。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一月,在巡幸鄂尔多斯时,即谕令皇太子胤初:“鄂尔多斯之生计皆佳……今朕得黄河所产石花鱼甚多,有自口内贡送者,亦有自蒙古贡送者,甚鲜而肥腻,味佳,因皇太后不食大鱼,故未遣送。”<sup>③</sup>此处虽然有称赞,却并未将“石花鱼”视为一种难得的河鲜。在更为私下的场合,康熙皇帝才表现出更为浓烈的喜爱之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途中,他在给顾问行的谕旨中提及:“二十八日,到保德州黄河边上,朕乘小船打鱼,河内全是石花鱼,其味鲜美,书不能尽。吃食皆有,惟白面最好。”<sup>④</sup>据此可知,即使如康熙皇帝之尊,要想获得石花鱼的美味,也要在黄河中捕捞,并不存在人工养殖的情况。

至雍正皇帝时,曾于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前伊都立任山西巡抚之时……将进献之物,每年开销银四千两。伊都立所进,不过山西土产石花鱼、榆次瓜之类,所值几何?亦借进物名色开销数千金之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sup>⑤</sup>虽然雍正皇帝将石花鱼视为普通之事,但整个山西能够被作为贡品者,也只有包括石花鱼在内的少数产品。

保德州属的渔户,仍然兼有农户的身份,是依靠耕牛的农民,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史实:“农渔二业本不矛盾,在不少地方且为相辅相成。”<sup>⑥</sup>但是,即使作为副业,渔户们面对各方的沉重加派,超量捕捞黄河中的鲤鱼,这种境况对于整个渔业资源而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上层统治者虽然偶尔也会视黄河鲤鱼为可有可无的贡品,但贡品作为整个官僚体系表现忠诚度的标志,往往却随着时间有增无减;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在于明确规定了贡品鲤鱼的数量。乾隆五十年(1785)冬,时任保德州知州的王秉韬以立碑的形式,详述了黄河鲤鱼作为贡品的数量和程序:

州境产石花鱼充天贡,每岁冬至前三日,恭进九十尾,年贡恭进九十尾而已。嗣因副贡馈赠之类,以其为物甚微也,遂日增一日,向设官渔般十二只半,渔户多至疲弊不可解。今酌定每年十月内,每船一只交样鱼六十尾,随鱼一百四十尾,计共得鱼二千五百尾,加以河曲帮鱼五百,足敷一年之用。此外倘再有需用者,每鱼一尾,官发价银一钱,仍拨渔船一半给与知照,先期移知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城三处,准官渔户境外网取贮湟,以资接济。如此,庶公事无误,鱼户得苏,似亦推广皇仁宪德之一端云。<sup>⑦</sup>

由此可知,位于黄河上游地区的托克托等地,因其同在黄河沿线,也出产黄河鲤鱼,但相较于保德州等地而言,数量显然是极少的。乾隆末年保德州一地进贡的石花鱼,年均在2500条,加之河曲等地的出产,共计3000条;不过,根据官僚体系层层加码的特性,最基层的渔户们捕捞的石花鱼数量一定是远远多于这一数字的。

除了作为贡品进入皇宫之外,更多的石花鱼是被各级官僚们分享,甚至会有少部分进入市场进行销售。清初康熙年间的宫鸿历,曾对石花鱼从出产到捕捞、进贡、流入市场等过程进行过生动的描述:

① [清]白君琳纂修,姜廷铭续纂:《保德州志》卷之三《风土·货属》,清乾隆五十年(1585年)增刻本。

② [清]白君琳纂修,姜廷铭续纂:《保德州志》卷之三《风土·土产》,清乾隆五十年(1585年)增刻本。

③ [清]爱新觉罗·玄烨:《谕皇太子》,《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二十二,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

④ [美]史景迁著:《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附录一,温洽溢译,第167、172页。

⑤ [清]允禄、弘画缮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四,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

⑥ 张建民:《论明清时期的水资源利用》,《江汉论坛》1995年第3期。

⑦ [清]白君琳纂修,姜廷铭续纂:《保德州志》卷之十一《艺文·定限鱼数碑记》,清乾隆五十年(1585年)增刻本。



定羌古岩邑,浑河喧地肺。鱼出保德州。波寒众鳞冷,涛奔万涡碎。山骨剥苍藓,唼啍各成队。旧闻石花鱼,上方作珍饈。

排船狎高浪,势如宋鹢退。河流奔迅,取之甚难。玉瓶举网收,盈尺若垂臂。花瓢注清水,醍醐灌顶背。倾泻不到地,坚冰已成块。四照琉璃中,红腮尚喷沫。鱼冬月取,以水注之成冰,即以帛裹之。

鲜腴入天膳,奇零落闾闾。一尾一金直,争买若珠琲。吾师上日宴,飒飒响惊濑。朝来食指动,下春得异味。翠鬣试一割,臙理众所爱。撑肠罄晶盘,洗耳听珠款。<sup>①</sup>

就作为贡品的石花鱼而言,人们在冬天将其从黄河中捕捞出来,再淋水结冰制成冻鱼,之后疾速被送往北京。至于贡品数量之外的石花鱼,往往就会流入市场(鲜腴入天膳,奇零落闾闾),成为官僚和士大夫们的餐桌佳肴。纳兰揆叙曾有诗《黄河鲤》称:

洪流赴海急如矢,水窗晨坐动食指。竹兔衫鸡久厌尝,时鲜果得黄河鲤。金鳞泼刺失波涛,饕子一见挥霜刀。石花强为立名字,臭味岂复分厘毫。大鱼盈船鱼价贱,道远还愁质易变。天南地北本无分,何必专求府谷县。<sup>②</sup>

此处所记载者,是与保德州隔河相望的府谷县,其黄河鲤鱼的生产,在清代也早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经营,自然也成为贡品的来源之一。清代康熙末年,许容在担任府谷知县时,即经历过解送石花鱼的事件:

府谷旧产石花鱼,历有供上成数。近绝其种,而上宪檄提如故,鱼户百余家无力办解,多有呼号鬻儿者。公廉访得实,捐俸各给银三两,往办起解。随吴文详陈,复见各宪面恳,始蒙裁革。<sup>③</sup>

根据上文引用的地方志等记载,雍正至民国时期仍然有大量的石花鱼源源不绝地被作为贡品和商品。由于长时期的捕捞,石花鱼也有绝种的风险;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只要减少捕捞数量即可。此外,府谷县出产的黄河鲤鱼,虽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仍然存在着道路遥远,无法长途运输的问题,这样自然也就限制了其市场的范围。

不过,这种以进贡为主要目的的黄河鲤鱼(石花鱼)生产,在明清两代并未能形成规模化经营,其中一个原因即在于资源的稀缺性,首先要保证皇家和官僚阶层的享用。上文曾提及,明代末年,每年冬天各级官僚都要关注保德州的进贡鲤鱼,使得附近渔民破产者甚众,虽然有不少御史、巡抚行文禁止,但往往很快故态复萌;清代渔户的情况,与前朝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官方以行政力量强行勒索,作为地方官的考绩,使得石花鱼进贡数量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

这一点也可以从河曲县的地方文献中看出,该县位于保德、府谷二县上游,同样出产鲤鱼,并作为所谓“冰鱼”的土贡出现:“水产能充土贡饶,鲤鱼冬月出天桥。谁抛玉尺离珊网,合荐冰盘佐酒瓢。衣解王祥寒自跃,筒盛杠孝取非遥。悬庭定许标清节,参政头衔署一条。”<sup>④</sup>这些作为土贡的黄河鲤鱼,其主要的享用者就是“参政”之类的官员。与此同时,在黄河鲤鱼的发展史上,自始至终没有国家的渔政介入其中,仅仅由地方官员将其作为一种地方特产加以管理。

① [清]宫鸿历:《少司成寄亭张夫子席上同诸君赋石花鱼,分韵得十一队》,《江左十五子诗选》卷三,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宛委堂刻本。

② [清]纳兰揆叙:《益戒堂诗集》诗后集卷三,清雍正刻本。

③ [清]李淇修,席庆云纂:《虞城县志》卷之六《人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本。

④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河曲县志》卷之八《艺文灯·集诗》,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

#### 四、地理环境与制度安排下黄河鲤鱼的经济开发

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黄河鲤鱼,在明清两代却没有大规模产业化,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个“物以稀为贵”的符号。其重要原因之一,要归结为黄河变迁导致的地理环境不稳定——明清两代的河工,在前期由于所谓“明清小冰期”的影响,黄河溃决的现象尤其严重。到18—19世纪时,由于太平洋季风的活动异常,导致东亚地区普遍出现大规模洪涝灾害,自明代开始的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发育逐渐上溯至河南境内<sup>①</sup>,这一大的环境史背景使得整个黄河下游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因此,黄河流经河南境内荥阳后的整个下游地区,在明清两代屡屡溃决改道,使得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始终笼罩在黄河决口的阴影之下。在黄河下游地区,河工是压倒性的第一位行政事务,河、漕二政的叠加,使得维持黄河稳定成为一项关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政治任务<sup>②</sup>。因此,这种沿河险工的存在,使得经济活动必须从属于河工这一政治任务。

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宋元之后不断发生激烈的决溢事件,尤其明清两代更为明显。有学者指出,有清一代“黄河下游河段决溢位置存在两次由上游向下游移动的变化……下游河段决溢核心区的演变趋势总体上是从上游向下游移动,但在局部河段也会出现由下游向上游移动的现象”<sup>③</sup>,下游地区的这种不断决溢的特征,导致无法有稳定的水体,对于鲤鱼等鱼类的生长与养殖肯定是极为不利的。为保证黄河下游河道的相对稳定,维护运河漕运的安全,明清两代均设有负责河道治理的官员,清初正式设立河道总督,以制度化的形式建构了一整套黄河河道治理的体系,形成总督——属官(道、厅、汛)的严密河官体系<sup>④</sup>,依据黄河下游水文地理的情形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种以政治需要为取向的制度架构,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黄河下游河道的相对稳定,却也使黄河在河道总督的赫赫威仪之下成为一种政治符号,维持了一条受人为力量影响极为明显的河道。

水体所有权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黄河不断的迁徙则导致经济利益要服从河工建设。黄河水体无法长期保持稳定的产权,成为黄河鲤鱼难以实现市场化经营的重要原因:黄河鲤鱼作为一个产业无法取得持续性的发展,虽然看似是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与制度安排的问题。因此,黄河沿线的黄河鲤鱼,无法像两湖地区和江西等地的湖、池资源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之下,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地方社会的稳定结构之下建立的所谓“水域产权”也就无从谈起<sup>⑤</sup>;甚至在豫东、苏皖北部,以及清末之后山东的黄河沿线地区,由于黄河时时存在决徙的威胁,地方社会结构被反复撕裂、重建,国家力量深度介入,并将黄河河工建设优先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之上,也就无从谈起能够维持黄河鲤鱼等水产长期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了。

位于中游地区的洛潼沿线、山陕河谷地带,没有规模化、市场化的黄河鲤鱼产业,其原因还在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即湍急的黄河使得黄河的放养几乎不可能实现。据上文的分析可知,鲤鱼在4—6月的产卵期,需要相对平静、营养丰富的水域,但往往又与黄河三汛之一“桃汛”的时间相重合;在黄河鲤鱼生长较迅速的5—8月份,又恰逢黄河的伏汛期,往往会出现泥沙俱下、水面猛涨的“烧河”状况,浮草沫、含沙量等剧增<sup>⑥</sup>,使黄河鲤鱼陷入缺氧的境地,造成大量活鱼窒息死亡。石花鱼的产地山陕峡谷地理环境的

① 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300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5年第8期;潘威:《清代嘉道时期河工捐纳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贾国静:《“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③ 孙涛:《1644—1855年间黄河决溢的时空分布规律初探》,《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④ 金诗灿:《清代河官与河政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49页。

⑤ 徐斌:《明清湖池水域所有权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河南省水利局、新乡师范学院生物系:《河南省黄河鲤鱼初步调查报告》,《淡水渔业》1976年第5期。

恶劣性,在史籍中的记载也不例外:“黄河出塞复入塞,有山斗绝当其冲。嘉鱼独擅石花号,泳游卵育巉岩中。此山不生凡草木,但有长松百尺摩苍穹。”<sup>①</sup>潼关之下也不例外,“君不见,黄河日暮风浪腥,雷霆怒转龙门底”<sup>②</sup>。因此,峡谷地形限制了黄河沿线湖、塘放养鲤鱼的可能性;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河道、大堤的状况,也无法维持产业化、规模化的黄河鲤鱼养殖。

不过,黄河鲤鱼的名声,由于河道总督及其权力的存在而长期维持了下来,官僚体系对黄河鲤鱼的需求量虽然相对较小,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却极大;当然,这种影响力一般都只集中于黄河鲤鱼的美味,很少提及文化象征意义,这也是黄河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所必须经历的世俗化过程。河工的存在,也使得整个黄河下游地区集中了国家的大量经费支出,成为所谓“金穴”,“嘉、道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钱亦最糜,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居度支十分之二……各河员起居服食与广东之洋商、两淮之盐商等,凡春闹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罢官之游士,皆以河工为金穴,视其势之显晦为得赈之多寡,有只身南行,自东河至南河至扬州至粤东四处获一二万金者”<sup>③</sup>。这种奢侈之风,在整个河工系统中可谓上行下效,“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甚,有积赀至百万者……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饌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sup>④</sup>;道光年间曾有野史记载“河工之奢侈”,并提及黄河鲤鱼在河工官僚中的食用方法:

有鱼羹者。取河鲤最大且活者,倒悬于樑,而以釜炽水于其下,并敲鱼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鱼尚未死,为蒸气所逼,则摆首摇尾,无一息停,其血益从头中滴出,比鱼死而血已尽在水中,红丝一缕,连绵不断。然后再易一鱼,如法滴血,约十数鱼,庖人乃撩血调羹进之,而全鱼皆无用矣。<sup>⑤</sup>

这种极尽奢侈的食用方法,却在河工官员们铺张的消费能力下,使不易获取的黄河鲤鱼成为河道官员们餐桌上的寻常食物,对黄河鲤鱼“美味”名声的传播能力,无疑是巨大的。

河道总督及下属道、厅、汛的制度设置,使得黄河鲤鱼只能成为官僚阶层享用的食物,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记载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政治因素的存在使黄河鲤鱼声名鹊起,同时也导致黄河鲤鱼的生产无法大规模展开。未步入仕途之前的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嘉庆戊辰年(1808年)自浙江前赴北京应试的途中,“抵王营(即淮安府王家营),索河鲤,不可得。得缩项鳊、巨首鲢,肥甘亦异常品”<sup>⑥</sup>,亦可知黄河鲤鱼虽然名声极大,但即使如世家子弟的麟庆,未入仕时也不能随意获得。因此,政治力量与纯粹的产业化二者之间,对于黄河鲤鱼这一产品的影响,区别仅在于其市场规模的大小:官方因其美味,则会垄断市场以保证黄河鲤鱼的特供需求;但由于市场利润的存在,黄河鲤鱼又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市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小生产,大流通”的基本状况,一定会导致有利润空间的产品进入市场<sup>⑦</sup>。

近代随着铁路运输的出现,黄河鲤鱼的市场范围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变。张之洞就曾经在湖广总督任上,与其幕僚易顺鼎品尝黄河鲤鱼,并作诗叙述其缘由,“时河桥告成,京汉铁路大通,故有鲜河鲤来鄂也”,其诗中称:“穷山蓝笋启,驰道铁椎成。梁驾惊鼉伏,书飞与雁争。尘红休驿骑,海碧杜长鲸。风马俄相及,河鱼夙有名。琴高初荐网,张翰正思羹。照座金鳞闪,堆盘雪鲙明。何劳颔贯柳,最喜饭宜杭。犹记龙门峻,难将鲋井衡。冯蠡耀神怪,茭玉萃公卿。跋浪庄知乐,充庖郑馈生。芳鲜等王鲙,残冷

① [清]纳兰揆叙:《益戒堂诗集》诗集卷四《食鲜石花鱼歌》,清雍正刻本。

② [清]朱孝纯:《海愚诗钞》卷二《以所得黄河鲤尾送汪苍岩兼柬此诗》,清乾隆刻本。

③ [清]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吃》卷下《金穴》,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④ [清]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吃》卷下《河厅奢侈》,第41页。

⑤ [民国]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1917年,第129页。

⑥ [清]完颜麟庆著:《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石门跃鲤》,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⑦ 张忠民:《“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笑侯鯖。”<sup>①</sup>如果没有京汉铁路的通车,从黄河岸边将鲤鱼运至武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种大规模市场化的行为,张之洞能够远在千里之外品尝到黄河鲤鱼,其背景原因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力量的主导。不过,因铁路等近现代交通工具的长途运输便利性,黄河鲤鱼的市场范围也确实有所扩大,其知名度亦逐渐从官僚士大夫阶层向一般民众传递,而且在近代史上,对黄河鲤鱼美味的记载,不只是中国文人笔下的专利,即使是近代的国外旅游者,也不会错过对其记下一笔。1909年,正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盖洛,在前往开封途中的火车上,就经历了这样的事:

我们的车厢里有位负责铁路警卫的军官,……他急切地提供旅游信息,预告了开封有三样必看、两样必吃和—样必饮的东西。……讲起二吃时,他变得滔滔不绝,满面红光地回忆起过去的宴会。有—种黄河产的鱼,味道鲜美,价格昂贵;通常买活鱼,讲价时鱼吊在那里挣扎着,讲好了价,鱼贩子便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把它撞死。—块钱只能买—条小鱼。<sup>②</sup>

此处盖洛笔下的“黄河产的鱼”,很可能就是黄河鲤鱼;不过,相较于中国传统文人仅关注鲤鱼的美味,盖洛更多将注意力投射在黄河鲤鱼进入餐桌之前的经历,为理解黄河鲤鱼从市集到餐桌的全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进入当代,梁实秋在其《雅舍小品》中,对各地美食都有过描述,其中还专门提及黄河鲤鱼者,“全国各地皆有鱼产,松花江的白鱼,津沽的银鱼,近海的石首鱼,松江之鲈,长江之鲟,江淮之鲟,远洋之鲑……无不佳美,难分轩輊。黄河鲤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豫菜以开封为中心,洛阳亦差堪颉颃。到豫菜馆吃饭,……点菜则少不得黄河鲤。—尺多长的活鱼,欢蹦乱跳,伙计当着客人面前把鱼猛掷触地,活活摔死。鱼的做活很多,我最欣赏清炸、酱汁两做,—鱼两吃,十分经济。”<sup>③</sup>汪曾祺也有记载称:“我不爱吃鲤鱼,因为肉粗,且有土腥气,但黄河鲤鱼除外。在河南开封吃过黄河鲤鱼,后来在山东水泊梁山下吃过黄河鲤鱼,名不虚传。辨黄河鲤与非黄河鲤,只需看鲤鱼剖开后内膜是白的还是黑的,白色者是真黄河鲤,黑色者是假货。”<sup>④</sup>因此,近代以来黄河鲤鱼的功能逐渐集中于食用,其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合而为一,食用黄河鲤鱼也成为—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 结 语

鲤鱼作为—种鱼类,因其本身的特征,除了食用、药用价值,还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逐渐被古人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在历史时期,黄河鲤鱼的分布虽然遍及上中下游地区,但比较著名的产地往往是各自区域的中心或节点城市,这—现象与黄河沿线的历史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并由此形成了—系列的黄河鲤鱼地理标志产品。

黄河鲤鱼被高度关注的时期主要集中于明清两代,并以其稀缺性成为特供皇家或官僚阶层享用的美味,但为保持其美味而形成的野外捕捞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黄河鲤鱼产业始终未能形成规模化经营,没有国家层面的渔政介入其中,仅仅由地方官员将其作为—种稀有物产加以管理。作为皇家特供的贡品,如保德州等地的黄河鲤鱼自然要保持其稀缺性,官方以行政力量强行勒索,作为地方官的考绩,使

(下转第77页)

①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古文书札骈文诗集》诗集四《食黄河鲤与易实甫联句》,民国十七年(1928年)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② [美]盖洛著:《中国十八省府》,沈弘、郝田虎、姜文涛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

③ 梁实秋著:《雅舍小品》,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95-196页。

④ 汪曾祺:《岁朝清供》,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